



“甜菜一代”与美国俄裔作家

2002年,美国俄裔作家加里·施泰恩加特(Gary Shteyngart,1973—)用英语创作的《俄罗斯少女社交手册》(*The Russian Debutante's Handbook*)由企鹅出版集团出版,首次发行量达到10万册。这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来说,似乎有些出人意料。同时,该书一出版就获得了“美国犹太图书奖”,并被英国《卫报》评为年度最佳小说之一。更重要的是,该书的面世,标志着一股新锐力量——俄裔作家在美国文坛上的崛起。紧接着,马克西姆·施拉耶尔(Maxim Shrayer,1967—)、萨娜·克拉西科夫(Sana Krasikov,1971—)、拉拉·瓦彭亚(Lara Vapnyar,1973—)、安妮亚·尤里尼奇(Anya Ulinich,1973—)等在俄罗斯出生的年轻移民作家,也纷纷出版新作,并获得各种文学奖项。

20世纪70年代至苏联解体前后,出于多种原因,大批前苏联公民移居美国,其中以犹太人居多。在前苏联出生并接受了俄罗斯文化熏陶的青少年,随父母移居到他们梦想中的“新世界”,并接受高等教育。他们的犹太血统、俄罗斯文化背景和美国受到的教育,使他们具有多重文化身份(Russian-American Jewish)。和所有移民一样,这些深受俄罗斯传统文化熏陶的年轻作家,经历了文化上“连根拔起”式的移植,与家乡的剥离和祖国文化传统的消失,是他们心中最深切的痛。最值得一提的是,家乡的味道,小时候习以为常的食物成了移民或游子寄托乡愁、寻找童年记忆的载体。这些俄裔作家对具有俄罗斯传统风味的甜菜浓汤情有独钟,其作品也充满了俄罗斯传统文化色彩,如女作家拉拉·瓦彭亚的作品,通过直接描述主人公对蔬菜、水果和其他食物的痴迷和偏爱,表达俄裔移民的集体乡愁。因此,他们被称为美国文坛上的“甜菜一代”(the Beet Generation)。

“甜菜一代”作家的主力军是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后期苏联解体前后移民到美国的俄裔作家。移民生活经历和从俄罗斯犹太人到美国犹太人的转变过程,为这些年轻的俄裔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和素材。文化上的“混血”不仅使美国文坛多了许多斯拉夫面孔,更为美国读者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以局外人身份看待美国文化的视角,用“祖籍国的文化视角和身为美国人的经历”,述说着在美国的移民生活和情感,其独特的创作视角和方法,不仅使其作品充满了跨文化色彩,也使美国文学更加多元化。

“甜菜一代”:美国犹太文学的复兴

伊萨克·辛格和索尔·贝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菲利普·罗斯在美国文坛上的如日中天,似乎

The Beet Generation: 美国文坛的“甜菜一代”

□刘文霞

标志着美国犹太文学已发展到顶峰。上世纪80年代,随着德系犹太人屠杀记忆的消退和移民经验的消失,犹太文学似乎已经风光不再。1977年,文学批评家欧文·豪(Irving Howe)在《美国犹太短篇小说集》的前言中宣称:“犹太人的后移民经验已经告罄,文学创作的可用性也已耗尽”,“他们的移民经验已经不可能植入已经被美国化的后代身上”,“犹太作家再也不能像以往一样创造出犹太文学的精髓,再也不能向世人塑造那种充满了欣喜与痛苦,具有强烈矛盾冲突的人物形象”。欧文·豪的这段话,预示并宣告了20世纪80年代犹太文学走向衰落并最终消亡的趋势,曾经被美国文学评论界称为“豪氏教义”。到了1986年,美国文学评论家莱斯利·费德勒(Leslie Fiedler)在《纽约时报》中也断然宣布:“美国犹太小说,与其说是作为一段历史,不如说是作为一种现存文学,已经完结。”

就20世纪的犹太文学来说,“豪氏教义”和莱斯利·费德勒的论断颇具预言性,但从长远来看,他们的论调似乎有些臆断。他们没有想到,上世纪70年代苏联的排犹政策和90年代苏联的解体引发新一轮的犹太移民浪潮,自然也无法预见在移民浪潮中的俄裔犹太作家会在21世纪的美美文坛异军突起。

相对于前辈作家,特别是20世纪的俄侨作家,这些新移民作家不仅接受了俄罗斯传统文化教育,还接受了英语文化教育,以双语创作。国际形势和俄语国家出版政策的变化,使他们不仅在美国拥有大量的读者并获得各种文学奖项,还享誉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获得美国犹太图书奖的马克西姆·施拉耶尔类似纳博科夫,是一位学者型的双语作家。有着“天才女作家”美誉的安妮亚·尤里尼奇,不仅获得了“哥德堡犹太小说新人奖”,还当选了美国图书基金会评选的“35岁以下最佳小说家”。她的处女作《佩特罗波利斯》(*Petropolis*,2007)通过描述犹太混血儿萨莎在前苏联和美国的生活遭遇,对女性受到的社会压迫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甜菜一代”的崛起,与其说是犹太文学的回归,不如说是复兴,是对“豪氏教义”的有力反驳。

凭借高超的写作艺术,他们以崭新的方式再现了“古老的移民叙事”。正如唐纳德·韦伯所说:“这些作家及其作品为悠久的犹太传统文学掀开了新的一页”。加里·施泰恩加特、马克西姆·施拉耶尔和拉拉·瓦彭亚等犹太裔移民作家的创作反映了犹太文学核心主题的回归。评论家安德鲁·福尔曼(Andrew Furman)指出,“施泰恩加特和他的同龄人在美国文学文化的大合唱中发出了属于俄罗斯犹太人的最强音。他们以自己的创作证明了自己和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以及马拉默德等传统犹太作家之间的亲缘关系……”

文化乡愁与族裔身份

希望与失望交替、错位与迷失共存,是美国俄裔移民的生活常态。理想中的“新世界”和“应许之地”在现实生活中成了“令人烦恼的福地”。“甜菜一代”作家亲身经历了移民生活的艰辛和文化精神的孤独,继承了传统犹太文学的“离散”主题——乡愁。

在美国,丰富的物质生活使他们暂时忘却了离愁,可突然有一天,他们发现,远离了家乡和亲人朋友,所有的一切都变了,甚至“脚踏雪地发出的吱嘎声也根本不及在俄罗斯动听”。他们只好把乡愁寄托在浓浓的红菜汤或俄罗斯大肉丸上。食物成为他们找回记忆的情感寄托。在拉拉·瓦彭亚的短篇小说集《食物与爱情:西兰花与其他》中,一碗热气腾腾的红菜汤能把主人公的记忆带回故乡,一场冬日的白雪能让年轻的主人公为追寻归属感而放弃眼前的所有。“甜菜一代”在创作中运用大量戏剧和讽刺元素,融入个人经验,描绘了俄罗斯移民思念祖国但又渴望自由、移居繁华胜地但精神上困顿窘迫与苦涩迷惘的画面。

移民改变了文化身份,也使身份认同更加复杂。“甜菜一代”作家不再期望“回归”,不再以“抵达”和“同化”为主题,他们更加关注的是后苏联时代跨文化世界中的身份认同问题,关注的是文化旅行和自我的文化身份转变,审视的是如何从纯粹的俄罗斯人转变成俄裔美国人的过程。美国公民、犹太血统、俄罗斯文化背景决定了美国俄裔犹太作家文化身份的“混杂性”。他们既活

在当下,又活在过去,既放不下犹太身份和俄罗斯传统文化的重负,又要应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压力。他们就像《一仆多主》中的特鲁凡尔金诺一样,疲于应对多重身份的转换。

对“甜菜一代”作家来说,祖籍国传统文化背景和族裔身份不仅是一种财富,更是一种负担和束缚。在施拉耶尔的中篇小说《阿姆斯特丹》中,主人公雅沙·格拉茨曼是在美国生活了17年的俄罗斯犹太人,经营着一家国际旅行社。为了彻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他改名换姓为杰克·格拉茨,甚至专程把祖父母的骨灰从莫斯科运到美国。36岁时,他爱上了美国姑娘艾琳并谈婚论嫁。但杰克对族裔归属和文化身份格外敏感。他担心和艾琳的婚姻会削弱子女后代的犹太性,要求艾琳皈依犹太教。笃信天主教的艾琳答应婚后会按犹太人的方式教育子女,学做犹太妇女应该做的事,但绝不改变自己的信仰。这使杰克十分懊恼,在艾琳家的遭遇更激发了他的犹太身份意识,决心和艾琳分手,只身一人前往法国尼斯。让他倍感困惑的是,他到底该不该娶一个与自己的宗教信仰完全不同的美国姑娘?犹太人赎罪日那天,他来到阿姆斯特丹塞法迪犹太教堂,他似乎找到了答案:当初他和父母离开俄罗斯时,已经背上了“身份”的重负;人生如一场永远无法摆脱重负的飞行,造化弄人。

“甜菜一代”中的女性作家,如安妮亚·尤里尼奇、萨娜·克拉西科夫、拉拉·瓦彭亚等,都从女性视角刻画了一群背负着犹太血统、俄罗斯文化背景、“邮购新娘”、得不到绿卡的黑户、单身女性、情人、妻子等一系列身份标签的俄罗斯女性移民令人心酸的故事。

背离抑或回归:
“甜菜一代”与俄罗斯文学传统

祖籍国文化和文学传统是移民作家的精神原乡,对祖籍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承袭是移民作家建构“祖国形象”的主要审美特点。曾经令上一代俄罗斯侨民作家魂牵梦绕的俄罗斯,在“甜菜一代”作家那里,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因为回归已经不是遥不可及,而是随时都可以实现。对他们来说,穿行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已经成为生活常态。

■作家原声

做一个强悍真实的诗人

□[加拿大]洛娜·克罗齐

“躺在婴儿床里吮吸手指/一排婴儿/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又没长着海明威笔下猫的六指//然而/此刻他的梦境是墨的梦/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见过的墨//父母尤其不知他最喜爱的莫过于清晨洗完澡湿漉漉的躺在裤子上/平静、平整的体现一方白色。”(《新生的作家》)

亲爱的青年诗人们,当我写这首诗的时候,我脑子里想象的是你们,我是用词汇想象出你们刚刚来到人世间的样子。我希望,这些微小的信息能在某天被你不经意地发现,它可以成为你日后与文学世界宏大对话的一部分。

此时此刻,也许你正坐在桌边,一边写作,一边要留意着小孩是否在啼哭;也许你是资深作家,是一个没有孩子的女孩。也许别人会跟你说,你的书是你的孩子,是一种不需要流血就降生下来的孩子。我想要让你们知道的是,书籍并不能取代你的孩子,它们不会像孩子那样吮吸母乳,也不会在凌晨3点打破你的宁静,让你因为关心而担忧他们。如果需要有一个比喻的话,那么你所写的字词是孩子的灵魂,是那种无形的、不需要哺乳便已经断奶的孩童的灵魂,并不是你手中能够握的一个小手,也不是那个可爱的皱着眉头的娃娃,当他走出门外的时候,你能从他的表情中回想起你小时候的样子。

我的家庭里没有一个读书人,我爸爸是一个干粗活的人,我妈妈每天要给人家做清洁工。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出生、成长,它的点点滴滴都已经深入到你的骨头里,你会对他们非常了解。亲爱的读者,请你告诉我,你住在哪里?当地的天气是什么样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呢?在那里人们如何安葬逝者?这些都是你会在一生的写作中无法抹除的痕迹,就像我们必须喝水才能活着,你也同样需要从所到之处汲取智慧。

你还记不得,在你刚刚从子宫的海洋里面游上岸的时候,你曾经到过的那个梦一样的地方,那个慵懒的、充满着厚重气息的地方,有很多像淡月一样的光线,四周

几乎是黑暗一片,充满着睡熟动物般温暖的呼吸。当我们写作的时候,会看到一张张脸庞,时不时地会贴近我们,观察我们,然后又转走。有一种气味会像法兰绒的毯子一样包裹着我们,四周充满着亮光。我知道还有数以千计的事物和感觉是无法名状的,这是每一个作者所要面临的困难。

年轻的诗人,你们将会爱上诗歌的美,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爱情方式。但千万不要不敢去打破形式,千万不能害怕让自己不加克制的大喊喷薄而出。多年前,我被邀请去写诗,关于女人生命中遗失的诗句,这是我们从来不曾展示给世人的。我决定将童年时代最大的秘密写出来:我父亲酗酒。虽然父亲已过世几十年,但母亲仍然不允许我们在外讨论父亲的任何过错。我的诗第一句就直言不讳地写父亲是一个酒鬼。我想当然地认为,我妈妈永远都不会读到这些诗集,但是我真是大错特错了,一年后,我妈妈在当地教堂里面听牧师的布道,牧师说他读了一个本地作家写的关于童年时期痛苦和治愈的一些文章,就开始念了。我妈妈当时已经70多岁了,左右都是熟识的人。我能想象她当时的情景,她根本不敢环顾左右,身体僵直,阳光透过教堂彩色玻璃窗,打在她脸上,划过她的脸庞和头发,像聚光灯一样让所有人都看到她的窘迫。

即使我写的让一些读者认为能够治愈他们的伤痕,但是却让我的母亲受到了更大伤害,让她被外界质疑,并感到羞愧,而且在余下的人生都无法摆脱这些伤害。但是,我还是要对你说,就像在40多年前我对自己所说的那样,一定要写你认为需要写的东西,那是源自你心灵最深处的东西,无论如何都不要压抑束缚自己,不论多么困难,多么隐秘,多么不可见,都要勇敢捉住它们,做一个强悍、真实的诗人。

我亲爱的诗人同胞,也许所有我所写的字词都是想要忘记一个不会改变的事实,我们所爱的人终究会离我们而去,甚至会先我们而去。我们不能超越过往,我们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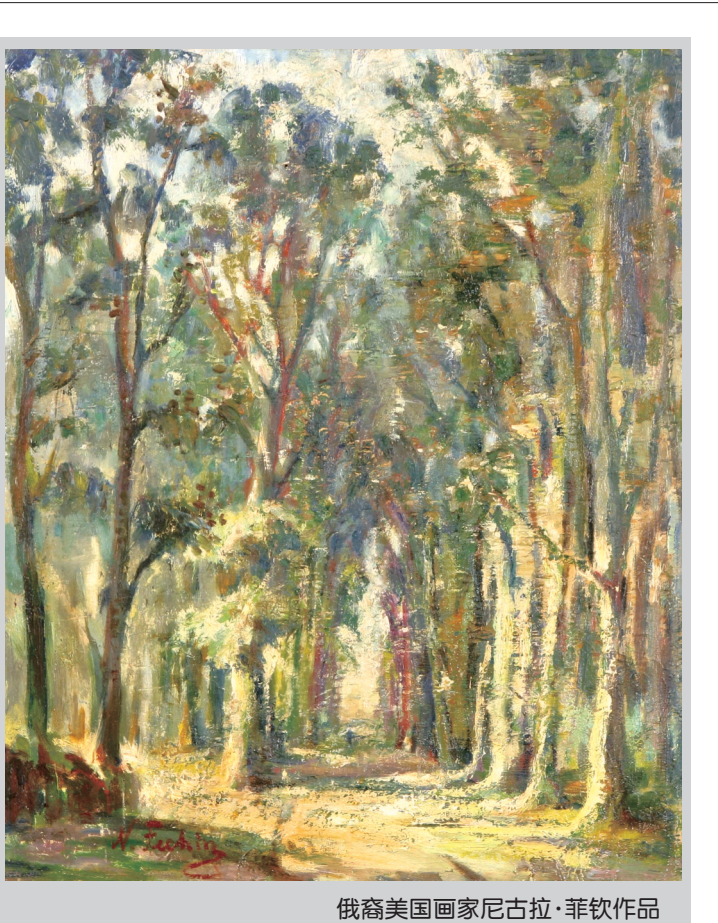
能试着减轻心头的重量。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你接受他们的逝去,因为你不是普通的人,你是一个作家。有一天你会感觉好像你已经脱离了自己的生活,好像你是从街对面窥视着你住处的窗户,看里面发生的一切,有一种冷静观察的超脱感,但是你看的是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事物,在你眼前一点点展开,此刻你的心是充满疼痛的。

在我母亲离世前一个月,我从她的住处离开,到一个宁静居所住了一个礼拜。与此同时,我的兄弟在家里照顾母亲。我必须完全沉浸于如何描写我母亲的身体一点一点虚弱,并且马上就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种种细节当中,我完全沉浸于我的悲伤、疼痛之中,我这样做并非是自己疗伤,也不是写什么娱乐性的东西,我是创造一种具有美学特征的距离,来拉开她的死亡和我能够接受她死亡之间的距离,我当初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呢?我的母亲在医院的病床上已经奄奄一息了呀……

我穷尽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写作方法,一遍遍修饰,去掉陈词滥调,我不仅要写出疼痛,还要写出有价值的东西,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将撒播、传送给这个世界。我感觉自己充满了愧疚,非常愧疚,什么样的女儿会这样做呢?但是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所做的一直都是将我生命中各种原材料吸收进我的身体,不管是疼痛、快乐、厌恶,都会通过我的血液在纸上留下印记。你如果刚好和我一样,不要误认为那是不好的,那并不代表你更加冷血或更加冷漠,你要学会原谅自己。

请让我用一首诗来结束这封信,诗的名字叫《新的一天》:“从跨过东边的田庄/一直进入到城里/光线不受阻碍的溢出/现在你可以走了/进入一直存在于你身体内的黑暗//即使渺小如苍蝇/也有自己的母亲/也有来之不易的一份悲伤//不知是谁给予了他们要不停地一遍一遍地擦洗自己的脸庞/直到他们发亮、发光”。

据洛娜·克罗齐(Lorna Crozier)10月1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座整理



俄裔美国画家尼古拉·菲钦作品